

世界巨富 发家史

下

SHIJIEJUFU
FAJIASHI

世界商业巨子的成功历程
及企业管理概念

世界巨富发家史编委会 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巨富 发家史

下

SHIJIE JUFU
FAJIA SHI

世界商业巨子的成功历程
及企业治理理念

（美）亨利·福特著 李敏译

中信出版社

世界巨富发家史

SHI JIE JU FU FA JIA SHI

《世界巨富发家史》编委会 编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4. 鼎力支持大陆体育事业

20 世纪 70 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他,把目光投向了大陆。他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务实,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

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迷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

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 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 102 磅。这时他才警觉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于是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 300 场,连续 10 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 43 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 100 万港元以上,他也乐于支付。

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972 年至 1977 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20世纪70年代霍英东就有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的心愿。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反华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97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雷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已经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取。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3/4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只有通过这唯一途径,才有可能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

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会议一方所持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把它长期排斥在亚洲足协之外。许多会员同意作为紧急事项列入议程,会长虽不大同意,也只得付诸表决。投票结果,赞成票刚刚超过 3/4。

列入议程这一步总算争取到了。接着是讨论中国加入的问题,这时又碰到难题,按章程规定,亚洲足协只接受已参加国际足联的成员。那时我国尚未参加国际足联。霍英东等又建议修改章程,提出章程可改为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会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足球比赛的,其队伍亦可被接纳为会员。按照规定,修改会章亦须有 3/4 以上票数通过。这次是用举手方式表决,结果又以 3/4 的多数票通过了。

还有最后一个是:接纳我国为会员,就得开除台湾。当时一些国家与台湾仍保持微妙的关系。但一经举手表决,赞成的仍是超过 3/4。于是我国足球协会取代台湾,在亚洲足协的会籍终得恢复了。连闯三关,一连以三个 3/4 通过议案的事,在世界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这虽然主要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霍英东的积极活动争取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通道。

亚洲足协的决定,不少人感到意外。国际足联会员闻讯十分震惊,当即采取措施,由国际足联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我国加入的决定是非法的,要求即予取消。此后麻烦事多了。国际足联有意要处分亚洲足协,台湾方面唯恐足球被突破了,会引起连锁反应,也极力向国际足联施加压力。

为了“维护票数”,国际足联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国际足联会长历来都是欧洲人担任。那时刚好第一次以非欧洲人(一个巴西人)当选会长,他对我国是友好的,但因刚上任,各方压力又大,只能谨慎从事,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处理。这个小组由每个洲

选一名代表组成,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每逢讨论他均据理力争,使国际足联无法作出结论。

1975年,亚洲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能否参加,这是关键性问题。虽然中国在亚洲足协的会籍已正式恢复,而在国际足联的官司尚未了结,如不获国际足联认可就让中国参赛,势必引起更大波折。香港足球总会曾拟拍电报到国际足联请示。但霍英东考虑如单靠一封电报,万一复电说不行,便无转圜余地,这将形成恶劣的先例,以后参加其他比赛也会遇到麻烦。于是他当即和震霆商量,要震霆马上赶去瑞士,请求会见国际足联会长、秘书长,他也随即赶去瑞士。会见时,他提出许多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香港亚洲足球赛拟邀请中国参加,希望会长、秘书长同意。

终于,他们开明地答应了,这便突破了缺口,1975年后所有比赛均可顺利参加了。其他各单项体育组织陆续接纳我国为会员国,是在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以后的事。

“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体育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呈现一派蓬勃生机。霍英东欣逢其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祖国体育事业。

1979年中国奥委会提出,只要台湾奥委会改名、改旗、改歌,就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体育组织,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这一设想,大多数代表都易接受,因而,1979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中国的设想被正式提出,并付诸表决,获得绝大多数代表支持,使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这使霍英东备受鼓舞,更加积极地为争取我国体育的合法权益尽力。

本来,有了国际奥委会解决中国问题的模式,其他许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皆可依样恢复我国会籍,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最早处理此事的,是1980年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

那次大会上正式提出表决,要求台湾改名为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国旗”,同时接纳我国人会。会上台湾代表发言,认为台湾与其他会员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改名,又不能奏国歌、挂国旗,说这是歧视。那次,霍震霆代表香港出席大会,他说,姑且勿论对此事如何看法,但照此通过,对中国,对台湾都有好处,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可以参与比赛。及后表决,以一票优势通过了。

几天后轮到国际足联开会,霍英东据理力争。那时有个情况令他担心,台湾代表对欧洲代表说,改名是可以的,但不必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那一句。欧洲人对此也表示同意,但如果不坚持加那一句,那岂不是又在制造两个中国吗?霍英东建议:台湾不能使用过去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歌,可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经过协商,欧洲朋友也同意他的意见,最后由国际足联的负责人与台湾代表讲清楚,这事终于解决了。

我国恢复国际羽毛球协会会籍更是困难重重,波折横生。羽毛球在各比赛项目中,也是重要的一项,在世界各地比乒乓球更普及,在东南亚影响也更大。东南亚各国羽毛球实力很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有些国家对我国的态度不友好,解决问题难度很大。

经无数次会议反复讨论,在国际羽毛球协会上终于通过了以中国代替台湾。后来台湾告到英国法院。我国外交部向英国表示,不能制造两个中国,但英国推说司法独立,还是判台湾胜诉。当时除乒乓球外,我羽毛球队最强,未能参加国际比赛,十分可惜。我国便和其他一些国家筹备成立另一个国际组织。但办起来比任何工作都困难,那时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支持,东南亚国家表面上是支持的,但内心很复杂。

霍英东为新建组织而进行了大量游说活动,首先是争取强队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中国和香港又不适宜担任会长,霍英东只好到泰国去,恳请泰国副总理当会长,这个国际性组织最终成立了。新的国际组织一旦成立,对原有组织就有压力。因为同一项目有两个国际组织,它就不能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不

久原组织终于接纳了新组织，两个组织在 1980 年至 1981 年间合并。这以后，又经历一些反复。到 1982 年，羽毛球又重新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霍英东随后也被推选为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会长。

我国加入篮联组织的事，在霍英东周旋下，早已解决了，但台湾策动另搞一个亚洲的组织，以南朝鲜人为会长，又产生新的问题。霍英东不得不往南朝鲜进行工作，提出是否成立这个组织，应通过投票解决。南朝鲜用通讯投票表决，他恐有人借口收不到票，制造麻烦，于是亲自出马，先后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把票收集了，直接送往南朝鲜，终于否决了这个组织。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在体育工作上霍英东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除致力于协助我国体育运动冲向世界之外，他还不惜资财，在经济上支持发展体育事业。1979 年，霍英东成立 10 亿元的基金会，用以在内地办些好事，其中不少款项是用于支持国内体育事业的。

1986 年秋，霍英东获悉我国为改变高等学校体育落后的现状，拟在全国建立几个大学体育训练基地，他认为这是实现体育强国的一项重大措施，当即致函国家教委，建议广州地区大学生训练基地设在中山大学，并捐资 3500 多万港元，在中大兴建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现代化的功能齐全的体育中心。建议马上得到国家教委的赞许。

这个现代化的体育中心，包括 5 个标准网球场，2 个排球场，6 个篮球场，1 座有 400 米塑料胶跑道、6000 座位看台的足球场，2 个 25×50 米游泳池，1 个标准跳水池，连同体育馆，占地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这样规模和设备的体育中心，在国外高等学校亦不多见。目前每天到体育中心进行锻炼的达 2000 多人次，为我国高等学校的体育教育体系开拓了一个新局面。

我国承办第 11 届亚运会，霍英东立即慷慨捐赠 1 亿港元。他还资助举办首届女子足球邀请赛，并与中国足协、广东省体委一

起,在广东举办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霍英东不仅为振兴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非常关心,热情支持的。他捐出1亿港元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还特意让他的两个儿子震霆、震寰作为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对祖国和家乡的深厚感情,要传给下一代,让世世代代都爱国爱乡,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5. 兴建广州白天鹅宾馆,开创了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河

我国过去长期封闭自守,身处香港的霍英东虽有报国之心,苦于无报国之门。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经验,发展旅游业。听到这消息,霍英东心里很高兴。1978年,他专程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会上他明确表示拥护政府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提出一些建议。尽管想法多多、顾虑重重,霍英东总觉得在内地办实业,更符合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将经济搞活。在当时来看,似有风险,但他仍想在这方面带个头,做些探索。办好第一批外资企业,使大家有信心,这将发挥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后,《澳门日报》发表了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的报道,霍英东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回内地发展旅游事业,兴建中山温泉宾馆的,并率先派香港设计师到当地进行勘测工作。同时按照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合资宾馆的计划,又在广州建造白天鹅宾馆。

为什么首先考虑建宾馆?霍英东认为既然开放让人家来,首先须有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生活环境。但在内地兴建现代化的宾馆,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那时大家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不大清楚,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旅游开放是否会带来精神污染?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那时物资短缺,一些宾馆洗脸盆塞子也没有,只好用热水瓶塞来代替,玻璃破了,便找块木板封住。)大宾馆消耗大,物资能否供应?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更紧张,群众是否有意见?交通方面,广州市内还没有足够的“的士”,建筑装修等方面也缺乏熟练的技工。诸如此类困难不少,矛盾很多。

还有服务工作上问题更大。人们吃惯了“大锅饭”,做事不讲效率。如果领导再来个官僚主义,扯皮事很多,手续繁琐,情况更糟。还有,广大群众如何看待投资者,是互利还是剥削?“文革”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投资,可领取定息,这本是支持国家建设的爱国行动。但是“文革”时期,股票放在亲友家里反而使亲友受累。霍英东想到这些,难免增加疑虑。但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想到如果成功地建设好一家现代化宾馆,这对增强大家信心,激励奋进精神,加速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引进都有莫大意义。他终于决定硬着头皮去试一试。

他首先选择在中山三乡雍陌温泉建第一座宾馆。当地既有温泉,又与翠亨中山故居、石岐、长江游乐园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区。他与何贤等共同投资 4000 万港元,与中山县(现为中山市)合作兴建。

那是 1979 年,物资缺乏,样样都要进口,廖承志曾对他说,内地只有砖瓦沙石和人力,其他就要你来搞了。在这种条件下,在 50 万平方米土地上建成 10 幢住客大楼,14 座别墅,共 200 个房间,包括附属建筑,总建筑达 6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园林式宾馆,而且要有与之适应的设备和良好的服务,又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办好,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

霍英东没有办酒店的经验,处理许多事颇费脑筋,但他虚心向人请教,又事必躬亲。在中山蹲了一段时间,处处抓紧,终于赶上预定进度。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如期开业。宾馆各种设备要从

外地进口,10万件物品尚未向美国落单,但他力主讲速度,讲效率,在当时至关重要。如果成效立见,可以鼓舞人心,对整治拖拉顽症会起示范的作用。于是争分夺秒,日夜督促赶工。

临近开业,水电尚未解决,他用承包的办法,样样限期办好。那时宾馆土建虽已完工,而室内墙纸、家具,甚至暖水壶、水杯都待进口后布置。有了水电,他马上通知人把在美国定购的东西迅速运来,不得延误一天。船到香港,物资立即转运到澳门,随即入关。来不及报关了,便申请特准,先入关再补办手续。

开业时需有住客,难得热闹。他在当地举办网球比赛,请来国内各地如北京、上海、广州以及香港的好手参赛。宾客即将入住,这对服务员是个考验。他们过去未受过训练,连吸尘器也不会使用。客人在房间丢下衣衫,要不要把它挂起来;客人饮剩一杯茶,要不要倒掉,都要有个章法,他又抓紧培训服务员。

开业那天,霍英东坚持举行正式宴会,而不是简便的酒会,使客人都能坐下来吃,这又增加了大量的工作。筵开百席,在那时来说,办副食品并不容易。他要求县政府给予支持,每个公社承包一道菜,比如烧乳猪即由一个公社包办,终于顺利解决了。

自1979年始建,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山温泉宾馆如期竣工了。他对工作人员多发一个月的奖金,以示鼓励。宾馆开业后,霍英东主张向群众开放,改变大宾馆的风气。开业当天,来了几千人,影响很好。

霍英东曾于1978年带领一个团到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回到广州时,许多亲友冒着风雨来到宾馆探访,被挡在门外一个多小时,才获入内见面。有的访客如未带证件,还无法见到。他认为这是很不合理的。即使不是访客或其亲友,就是游客来参观,也该让他们进来。让大家看看新鲜事物,领会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新。中山温泉宾馆整个建筑群有东方宫殿式的气派和园林式的幽雅,显示了中国民族建筑和园林建筑艺术特色,很有吸引力,人们都想看看,何必把他们挡在门外呢;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

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人来多了,生意便兴旺了。

温泉宾馆开创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河。1982年,他又投资1500万港元,与温泉宾馆合作兴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设72棒、18个洞,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填补了我国高尔夫球运动项目的空白,并在当地三乡中学挑选人员,培养我国第一代高尔夫球运动员。

温泉宾馆开业以来,以其优雅舒适的环境,先进的设备,优质的服务,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宾馆开业十年来总收入达3.75亿元,资产总值1亿元。

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兴建,是霍英东促进祖国旅游业现代化的又一创举。1978年,他向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人提出建议,在广州建造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宾馆,立即得到省市领导赞许,并决定由他和广东省旅游局共同投资两亿元兴办。

选择宾馆地点颇费思量。因为宾馆四周环境很重要,如果选址不当,影响日后长远发展,难以补救。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市内公用交通工具不足,加上考虑住客购物方面,酒店一般都建在火车站或友谊商店附近。经过几次对全市亲自勘察,霍英东发觉沙面河畔有一块淤寒沙滩,靠近西濠口,是广州繁华地区。他认为在那里兴建宾馆是最为理想的,填河取地,可免拆除阻滞,便于迅速上马。有人顾虑填河麻烦,他却有填海经验,有把握建设好。他决定拨款多填6000平方米土地,另捐资300万港元建设公园,增添沙面休憩地方,使沙面胜景不减。有人以为他是借鉴耸立湄河畔的世界著名的曼谷东方酒店,其实也不尽然。白天鹅宾馆面临珠江三江会合的白鹅潭,河面辽阔,风景特佳,比曼谷东方酒店更具雄伟气派。

建设白天鹅宾馆的繁重工作千头万绪,霍英东抓住关键问题出主意,定方针,而且一针到底。比如如何选点?自己设计还是请外面设计?是自己施工还是请外面承包?宾馆由自己管理还是请外国人管理?对这些重大问题,他坚持应由自己设计、自己施工、

自己管理。他提出“三自”方针，充分相信中国人有能力把事情办好。

对宾馆的建设，霍英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广州参加设计宾馆的座谈会，倾听来自香港及广州的建筑师、专家们的意见。在座谈中他察觉到，由于内地建筑业自我封闭 30 年，建筑师对新事物缺乏认识，而香港建筑师则对内地情况了解不多，都有局限。由于设计工作涉及 30 多个部门，他以为香港方面的设计师未必能考虑这么多的复杂因素，局限很大，而由一批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负责设计是比较合适的。为了弥补内地建筑师对现代建筑认识不足的缺陷，特邀请他们到香港参观考察一段时间，使他们大开眼界，终于设计了一座耸立在白鹅潭畔，既具现代气派，又不失民族风格，属国际一流水平的宾馆。这家宾馆主楼 34 层，附楼 3 层，建筑典雅堂皇。步入大堂，一幅三丈多长的人造瀑布，悬空挂在嶙峋的假石山前，引人注目。山上一亭一景，使民族建筑风格更加显著。海外游子皆喜欢在“故乡水”的美景前拍照留念。

关于施工问题，霍英东主张还是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但要采取新的办法，以承包方式进行。设备的采购最为复杂，经过温泉宾馆的建设，他对此已有经验。

当时内地物资缺乏，许多物品要向世界各地采购。这些采购业务他也交由内地人员自行负责，自己从旁协助。这也为内地培养了一批采购人才。

白天鹅宾馆的管理，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交由外国管理集团管理，其二是由当时完全没有干过宾馆行业的内地人士自行管理。外国和香港的高级酒店多是委托管理集团负责组织客源和管理的，但要签上 10 年、20 年或更长年限的合约，并掌握一切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而又不负责盈利。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易。他们对内地情况不熟识，难以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出外采购也有困难。大批雇用海外职员，待遇与本地人差距太大，

亦容易引起员工之间的矛盾。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他还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的方式。整个宾馆 2000 多个员工,没有一人干过酒店行业,却管理一家现代化的大宾馆,这是个大胆的尝试。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几经艰辛,终于把白天鹅管理得井井有条。

白天鹅如何管理?霍英东提出总的要求是一切安排务求达到“宾至如归”。海外酒店,楼层不设服务台,内地则每层设服务台,而不设总服务台。他按中国习惯,每层仍设服务台,又设总服务台。他认为每层楼有服务员照顾客人很有好处。有人不懂得英语,要找人办事、打电话都不方便。当然 28 层楼,层层设服务台,多用了一批人,增加了成本,在海外是难以负担的,但内地人员工资低,可以承受。希尔顿酒店的专家来看了,也认为这个设想很好。

由于既按国际惯例办事,又根据内地实际情况斟酌变通,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大家同心协力,终于使宾馆赢得国内外广大宾客的赞扬。1985 年 7 月,白天鹅宾馆正式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正式成员,成为我国第一家世界公认的一流酒店。1990 年 2 月,白天鹅宾馆被国家旅游总局评定为国内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与中山温泉宾馆相仿,对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也极力主张对外开放,但面临的情况却不一样。白天鹅在广州不仅本省人来看,还应预计外省来的人也会来看,人员肯定很多。当地又不是广场,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但他宁可冒点风险,也主张对外开放,目的是让大家增广见识,增强信心。因为这是国内大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事实证明,开放效果比中山温泉宾馆更好。

6. 中山大学的名誉博士

1987 年 2 月 7 日。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同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山大学将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

霍英东在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之后,登上讲台作了题为《从白天

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学术演讲。其中心论点是：一业带动百业兴，白天鹅宾馆既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又给改革、开放以有力的促进。演讲以白天鹅宾馆坚持自己设计、自己施工、采购及自己经营管理方针的具体事实，有力地说明炎黄子孙的智慧和才能，说明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并展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霍英东得到这个荣誉，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所达到的成就的结果。正如王屏山说：“赤子获殊荣，当之而无愧。”马蒙教授说：“从他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他能获得今天的荣誉，可说是实至名归。”

霍英东对祖国和家乡建设的支持，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近10年来，他通过几个基金会（包括霍英东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基金会、霍英东番禺建设基金会），资助了110多个建设项目，分别以投资合营、捐赠低息贷款等方式进行，其支出金额截至1991年3月份，总共13.266亿港元。完成的具体项目有：中山温泉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饭店贵宾楼、北京首都宾馆、广珠公路4座大桥、广珠公路扩建、洛溪及三善大桥、沙湾大桥、番禺体育馆、中山大学体育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和仲恺农业技术学院教学大楼、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中国体育历史博物馆及中华武术研究中心、北京体育中心游泳场馆、中山运动场等。

他为祖国、为家乡的建设，苦心谋划、尽心竭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却非常谦逊地说：“我的力量很小，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尘粒。”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位具有自己独特气质、素养和才能的实业家，他既勇于开创自己的事业，又热心支援祖国的建设，他的拳拳赤子之心，备受海内外人士的赞扬。

华人首富林绍良

林绍良 1916 年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牛宅村。

1938 年,林绍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爪哇;1945 年,在印尼独立战争中进行军火买卖,认识后来统治印尼 32 年的铁腕总统苏哈托,先后成为“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

拥有近 100 亿美元资产的林绍良,被美国《投资家》杂志列为当今世界 12 大银行家之一,号称是“世界第六巨富”,被一些媒体誉为“世界华人第一富豪”。

1. 印尼独立战争中的军火买卖让他结识了后来的铁腕总统苏哈托

林绍良家祖辈以种田为生,有祖传的水田 30 亩,一头水牛和一些农田。林的父亲为人朴实敦厚,他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性情温和。幼年林绍良在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养成推崇忠烈侠士以及儒家道德观念的思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军侵占福清,为了避免被抓壮丁,林绍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爪哇,投奔叔父林财金。叔父开了一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当时的印尼也是兵荒马乱,市面萧条,赚钱并不容易。林绍良独辟蹊径,向叔父提出到外面去“搞推销”,这一招十分有效,油店销售额于是成倍增长。

没多久,林绍良想只身到外面闯一闯,便独自做起兜售咖啡粉的小本生意。他每天半夜起床,把咖啡豆磨成粉,然后用旧报纸分包 50 克或 100 克的小包,不管严寒酷暑,骑着自行车跑到六七十公里外的镇上出售。这个生意虽然盈利不多,但却培养了他的胆识,使他接触了很多,积累了社会经验。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印尼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又打响